

黃子平 序

「南斗文星高」——你說，最早鼓吹香港散文的「典藏」價值的，是羅孚。早在三十多年前，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他以「柳蘇」的筆名，在北京的《讀書》雜誌連續撰文，介紹曹聚仁的隨筆，葉靈鳳的小品，高雄（三蘇）和梁厚甫的怪論，乃至亦舒、林燕妮的言情專欄，以其曉暢靈動的文筆，彩繪了一幅「鶯飛草長、雜花生樹」的香江文苑風景。像〈你一定要看董橋〉或〈無人不道小思賢〉這樣斬釘截鐵的標題，體現的不僅是向內地讀者力薦佳作的熱忱，而且是身為香港文學的策劃者、實踐者的識見與胸襟。

其實，羅孚本人，更是這不容忽視的，風景中的風景。

膾炙人口的，譬如「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海光文藝》等雜誌的籌辦，《知堂回想錄》的促成，聶紺弩《三草》的印行，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項，都值得在香港文化史上濃墨重彩記上一筆。我想說的

反而不是這些，而是他自己從四十年代起不懈的寫作。若單從輯成集子的書名看，《風雷集》（1957）、《繁花集》（1972），自是承襲了「左翼文學」南來一脈；內裏卻有許多「風花雪月」，非主旋律的異質文字。依羅先生錐心坦白，早年的文章不堪卒讀，自己乃是個「粉飾太平」的真誠的「歌德派」：「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樣的良知、勇氣和自我揭露，自巴金的《真話集》之後，乃屬罕見。

「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這是羅孚先生後來一再引述的聶紺弩詩句。文章與思想，口與心，此間的誠偽難易，無論在京在港，都在彰顯當代知識人的寫作困境，不得不與政治權力進退周旋。讀書人生命與寫作的自由和不自由，成為羅孚念茲在茲，不斷思考與探詢的焦點。是以自1982年起，居京十一年，文風丕變。無端羈留京師，成了一個「神州袖手人」，卻也成就了他為人為文的一大轉機。早年無意識的潛在的「異質文字」，轉化為他有意為之特立獨行、自己的「主旋律」。上世紀末的那十年，正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分。羅孚此時作為「一個普通的北京居民」，在北京文化界知識界，不好說是「廣交遊」，卻也在某一圈子中，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憶。發而為文，依陳子善的說法，是為「重現八十年代」，留下了一份難得的「實錄」。這就用得着京中常引用的另一個「當代典故」了，吳祖光家中的橫幅——「生正逢時」。羅先生自己卻謙虛，說這些回憶雜記，不過「野史」而已。

但又立即補充說，野史可補正史之遺，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實，「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就更有意思了」。文氣的抑揚與頓挫，正可見出此公內心的「倔」。不說「抵抗遺忘」，不說「去偽存真」，用的只是「趣味」和「意思」這樣的平常字眼，正是「柳蘇」遠勝「羅孚」多多之處，一種不動聲色的老辣，卻又內蘊了難言的無奈與憂傷。我讀「柳蘇」散文，每於此處為之動容，低徊不已。

彼時羅孚的寫作，循兩個方向展開：其一，「香港作家剪影」系列，其二，「新文藝家的舊體詩」詩話。前者，羅孚把許多失落在港九的文人行蹤重新帶到讀者面前，從徐訏的女兒到蕭紅、蔡元培的墳，盡寫幾代華人顛沛流離、漂泊離散的悲歡。後者，羅孚發展出一種「現代詩話」的文體，抄錄並評述當代北京文化人已發表或未發表的許多「舊體詩」，及時向世界華人讀者「報道」了當代詩歌寫作的一大重要趨向。

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學勃興，最「堅貞決絕」的文體非詩歌莫屬。自胡適《嘗試集》之後，寫「新詩」的人才有資格稱作「詩人」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寫的「押韻的句子組合」，則被不無貶義地稱為「舊體詩」。舊習難除，朋友酬唱寫幾首，每每「不好意思」，像馮至就自嘲為「屍骸的迷戀」。有趣的是，一個世紀了，迷戀無法祛除，似乎還將迷戀下去。羅孚在北京接觸的舊雨新知，如聶紺弩、

邵燕祥，很多原是寫新詩的，卻都寫起了舊體詩，文革之後，越寫越多，越寫越好。「新文藝家的舊體詩」，這個使文學史家撓頭的現象，卻成為「程雪野」（居京期間又一筆名）開掘不止的寫作資源。由對聶紺弩《三草》的箋注，發展成整本的《燕山詩話》，羅孚闡發了聶紺弩、啟功、楊憲益等一大批「現代打油詩」的「滑稽詩學」（聶紺弩：「寫詩不打油，那是自討苦吃」，程千帆：「滑稽亦自偉」），把專政體制下「笑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羅孚指出，「以雜文入詩」的傳統始於魯迅，他那知名的「自嘲」就是典型的「打油」：「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以個體的特立獨行蔑視「正史」的春秋褒貶。羅孚自己也寫舊體詩，詩風不那麼「打油」，卻也時有「滑稽自喜」之作。聶紺弩讚曰：「每三句話賅天下，不七尺軀輕萬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

「每三句話賅天下」，這是詩人的誇張，卻也道中了羅孚散文的或一特點。在我看來，資深老報人的新聞敏感，親歷者踐行者的歷史洞識，趣聞逸事的生動細節，曉暢而又睿智的文筆，凡此種種無以倫比地融為一體，最是羅孚散文引人入勝之處。回想柳蘇用過的散文標題，你說，是的，有些句式是具有「專利」性質的，重複、襲用或套用，都難免俗氣；但你還是忍不住，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斬釘截鐵，說：香港散文麼，——你一定要讀羅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 錄

i	《香港散文典藏》出版說明
v	黃子平 序
001	從胡喬木到喬木
013	從俞平伯到胡風
026	秦似悲田漢哭孟超
037	「飽吃苦茶辨餘味」——關於《知堂雜詩抄》
049	楊憲益詩打一缸油
060	陳邇冬十步話三分
071	鐵骨錚錚邵燕祥
083	「至今人厭說秦皇」
091	回想《知堂回想錄》
099	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118	我所知道的葉靈鳳先生
127	繁花時節懷紺弩——《聶紺弩傳》代序

136	俠影下的梁羽生
147	梁厚甫的寬厚和「鬼馬」
159	像西西這樣的香港女作家
172	劉以鬯和香港文學
184	你一定要看董橋
196	丹青是燦然的，不朽的——懷念林風眠老人
205	兩次武俠的因緣
214	小記蕭銅
223	徐訏的女兒和文章
232	半山一條文學徑
242	黃永玉和沈從文夫人
251	廿年一畫慶珠還

258	范用溫馨的小書
264	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海光文藝》二三事
273	小思的散文心思
281	黃宗江是善本奇書
284	朋友的圈子
292	鍾敬文和啟功
307	文學大師的驚歎
327	苦雨齋訪周作人
337	農村的消失

從胡喬木到喬木

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後，武訓也總算得到了公開的平反了。

嚴格地說，還只是半平反，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乾脆就不說「平反」，而只說是「糾左」。

「糾左」？誰的「左」？毛澤東。誰在糾？毛澤東當年的秘書胡喬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今天在這裏否定了五十年代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他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大會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華社這麼說。據說，胡喬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認為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

儘管這兩個「不能」說得有些吞吞吐吐，卻還是被認為是對武訓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實上，這只是對《武訓傳》批判的否定，還不是直接為武訓平反。當年武訓被斥為「清朝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這三項大帽子還沒有正式摘下來。

這三頂帽子——「奴才」、「對頭」和「幫兇」是跟着一個「主義」而戴上的：「投降主義！」毛澤東在中南海看《武訓傳》時，吐出了這句話，未終場即去。也可以說是終場，他這一走，電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訓也就完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跟着展開。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儘管「猶抱琵琶」，今天由他來否定這一場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儘管他沒有提到當年自己如何如何，這也許由於並不是在作「全面的評價」的緣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於他生前推崇武訓的辦學精神，也可以說他就是有着「武訓精神」的教育實踐家。自從《武訓傳》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頭來，他也就成了連帶被否定的人物，武訓的異代連坐犯。這也正是為什麼胡喬木要在陶行知研究會

和基金會成立的時刻，來否定對《武訓傳》的批判的緣故。

其實，第一個半公開為武訓平反的，不是胡喬木，而是萬里。萬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學張紹虞談話時，才為武訓平反，這場談話一開始他就說：「我已經在全國教育會議上兩次給他平了反嘛。」（見《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號〈武訓平反問題三文件〉）。這個「已經」，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說，在有關會議的文件上有記錄，不過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開的平反。

萬里的半公開，不等於胡喬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轉彎抹角地說，不能把武訓稱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農民階級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說，要平反。雖然不知道他還具體說了些什麼，比起胡喬木的話來，他是快人快語了。

雖然是快語（萬里）和不夠爽快之語（胡喬木），都了無詩意。

但不可不知，胡喬木卻是個詩人，正和毛澤東是詩人一樣。

不「全面評價」對《武訓傳》批判的他，在詩詞的創作上，是比毛澤東更全面的。他不僅寫舊體的詩詞，還寫新體的詩，簡稱新詩的詩。他不僅採用中國古典詩詞的格律，寫新體詩時，還用西洋詩的格律。

記得在「文革」以前，《紅旗》雜誌曾經用過整整一兩頁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詞，都是格律謹嚴的，其中有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霹靂一聲春，風流天下聞」的句子；也有詠西湖邊上拆掉那些偽託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這兩年，地位高了，他的舊體詩更在《人民日報》主要的版面、顯著的地位，新聞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話新詩。

據說，他在愛寫舊體詩的胡繩處看到香港出的聶紺弩的舊體詩《三草》，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補充修訂本。就主動上門，拜訪病榻上的這位老詩人，又主動表示要替這一《散宜生詩》寫序，在序中讚揚這是「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詩史上獨一無二的」。

這件事很表現他的詩人的性格。如果能更多地表現就更好了。

胡喬木的送序上門，據說曾經使聶紺弩有過一點顧慮，他怕不知道的人以為是出於他的主動，是他在走上層路線。熟悉他的人當然明白，他不是這樣的人；而不熟悉的人，好像也沒有這樣的誤解。他這才心安理得。

聶紺弩又是怎樣的人呢？有一位年輕的作者，說他是「躺着幹活的

人」。

七八年了，從山西的監牢回到北京的居所，他就一直是躺在床上，近年的一些新作，就是這樣躺在床上寫出來的。其間他也參加過文代會議和政協會議，而他的參加，只不過是從家裏的床上轉移到會議賓館的床上，還是躺着，不開會而自有會，會見朋友。

八五年六月間那首〈弔胡風〉的詩，就是躺在家裏的床上寫出來的。

八四年二月間那篇〈談《金瓶梅》〉的文章，也是躺着寫成的。寫作的時間似乎比文章的內容更使人感到興趣，因為那正是「清除精神污染」之風吹蕩着的時節。

文章一開頭就先在潔或不潔上做文章：「人多不談此書者，因為其中描寫多不潔處。書固不潔，但不談亦不能使之潔，更不能自潔潔之。且科研之下，不分潔否。凡醫院均有檢驗不潔物者，然則談談《金瓶梅》，亦未必志在自求不潔，或使人不潔」——也就是並非志在使人精神污染。

文章的結尾是聶紺弩的坦白認錯。他說，魯迅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提到「像聶紺弩犯的錯誤」，但沒有明言是什麼錯。他說，錯在他當年寫過一篇文章〈關於世界文庫翻印古書〉，一攻

擊了鄭振鐸，二攻擊了翻印《金瓶梅》是「翻印淫書」，而且不以為是世界名著。第二點今天看來真是「無知瞎說」了。

承認《金瓶梅》有不潔的一面，但肯定「它客觀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獸、美中之醜的部分，使人知道了獸與醜，從而轉悟到人與美，或即人的覺醒的前奏的一部分」。這就是聶紺弩的一個主要論點。

有人於是寫了一首訪紺弩的詩：「京塵幾輩同炎涼，八二芳齡一老槍；冷眼對窗看世界，熱腸倚枕作文章；聲名灌耳麻雷子，品藻從頭屎克郎；莫說金瓶淨污染，千秋悲劇屬娘行。」聶紺弩八四年「年方八二」，還抽煙，可以說是老槍，儘管抽的是香煙而不是什麼鴉片。倚枕作文，是躺着幹活，不作文的時候，眼睛時時瞧着窗外，看着吟着「窗外青天兩線交」。麻雷子是一種鞭炮。屎克郎是一種小蟲，愛在骯髒的糞土中穿來穿去，近年澳洲有人研究，發現它居然是益蟲，因此對它也就刮目相看，「品藻從頭」了。這一句可能和聶紺弩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作詩的黃苗子要拿屎克郎和麻雷子作對、要拿品藻從頭和聲名灌耳作對罷了，而且自鳴得意，自認是巧對。至於「莫說金瓶淨污染」，那才是讚聶紺弩熱情大膽寫出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以這讚聲表示對「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作了微微的諷刺。

楊憲益見了這詩，和了一首：「從來客去即茶涼，說理書生怕見槍；

舉世皆批人性論，羨君先讀好文章；願逢縱欲河間婦，不作無能武大郎；潘氏瓶兒皆可愛，小生一向重娘行。」

原詩是遊戲之作，和詩就更是遊戲之作了，有些話不必認真，但字裏行間，卻可以看到對「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有更大的諷意。

一開始頗有一點大搞運動之勢的「清除精神污染」，後來終於不得不收斂而納於正軌了。不過，因此而下台的胡績偉和王若水儘管沒有受到更進一步的「治理」，卻也沒有恢復原來的位子。當然，他們是用不着恢復名譽的，他們的名譽不僅沒有因此而被貶低，反而是更高了。

據說，王若水關於人道主義的文章，包括對胡喬木文章的反駁，不久會有書出版。胡喬木表示對他自己的文章是理所當然的可以爭議。又據說，他還對王若水的生活表示了關心。如果一開始迅雷疾雨少些，關心多些，那就好了。

至於《金瓶梅》，在不那麼運動式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潔本在八五年終於發行，並沒有加上「內部發行」的標誌。從書中的〈標點說明〉可以看出，這書在一九八〇年就校勘、標點、刪節好了，經過了四年多的等待，才能出書。由於只印了一萬部，書出而引起有人願以十倍於十二元定價的數目以求必得，也